



2017年6月，朱教授在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舉辦的《大師演講》講座分享他對中華文化的看法。

要做到這一點，大馬華人應該有懷抱全馬來之心，以成為大馬全國的領導自期。而要讓其他民族能夠信服，中華文化之弘揚應是主要的切入點。以中華文化取信於大馬的多元民族，朱教授提出了幾點建議。大馬華人必須立心要己，好人也好，不應因中華文化之源遠流長而鄙視他人，不可夜郎自大，應該友愛友族。要懂得分享，「所以大馬的華校如有任何活動，亦應邀請其他族群參與，共同體驗中華風俗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特色。」同樣重要的是，要學好其他族群的語言，這樣才能夠主動和他們溝通，也可以改善大馬華人只懂華文，無法融入大馬的被動局面。「加強英文和華文教學，對他們（大馬華人）來說雖然辛苦，但非常值得。」

談及如何在馬來西亞社區開展中華文化教育，朱教授明言中華文化範疇很大，要學，便由最基本的《詩》、《禮》教育開始。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詩歌能夠陶冶性情，能通《詩》教，則人也會溫和而寬厚；禮儀講求社會秩序和行為規範，能通《禮》教，則人也會謙遜而莊重。其次是實行名勝教育，讓這些華人後裔立於文化遺址之前，「發思古之幽情」，久而久之，對華人身分的認同或會更深。

如何引起馬來西亞其他族群對中華文化的興趣，也是重要課題之一。朱教授以檳城和馬六甲為例，指出當地很多華人寺廟和祠堂，管理這些建築的宗親會、同鄉會或會館，還有當地華人社團，對待自己家鄉的習俗都非常認真。現時的華人社區對家鄉的習俗、節慶仍有濃厚感情，逢年過節必會大張旗鼓以示慶祝。很多華校還有獅隊，許多年輕人都參與其中。朱教授說，大馬的華人更應藉此向其他族群介紹中國的宗教文化和社會風俗，讓友族在同樂之中欣賞和領會中華文化的可愛之處。華人領袖們亦應力邀年輕華人加入同鄉會等社團。這樣既可宣揚中華文化，亦可做好文化傳承。朱教授介紹，現在有不少獨立華文中學（獨中），如他到訪過的巴生興華中學，更舉辦了古代稱之為「冠禮」的成人禮，在學生成年時，請他們穿著樸素服裝，向父母表達感謝。他稱讚獨中在傳承中華文化方面，像這樣的禮儀，便做得非常之好，富有倫理意義。

求學路上幸遇良師 研究路上受益匪淺

朱教授在大馬的講座獲得當地華人領袖和社會大眾一致好評，他的建議除了給聽眾帶來極大啟發之外，更顯示了其深厚的學術根底。1972年，朱鴻林教授在香港珠海書院修讀中國文學及歷史本科。本科畢業後，他繼續在珠海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攻讀碩士，在讀期間獲得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先生和資深中國古典文學學者王韶生先生的指導，接受嚴謹的史學訓練和對古人文字認真理解的學術態度，為日後研究明史打好基礎。1978年碩士畢業後，朱教授旋即考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4年獲得博士學位後被留校任研究員，恩師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安排他閱讀大學所藏的中國古籍，撰寫提要以及編刊《葛思德圖書館學報》（The Gest Library Journal，後來易名為《東亞圖書館學報》/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朱教授因而得以特別飽覽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所藏影印日本內閣文庫書籍逾700多種，並且草寫了三百多篇文集提要，籌辦了一個中國古籍和書法的展覽。

對中華文化傳播的看法

朱教授對於南洋國家的中華文化有這樣的看法。南洋華人能夠保存不少的中華文化，這與中華文化傳播中的「漣漪」現象和效應有關。這種漣漪現象，就如向一塘水中投下石塊，漣漪即向周圍蕩出，同樣的波紋蕩到外圍越遠時，原來中心的波紋越見微弱，甚至不見了，到了新的刺激來時，新的運動又從這個原來的中心開始。中華文化的發展，便是在這樣綿延的新舊推移狀態中進行著。這與中國歷史走向的關係非常密切。

「中國的主流文化，是由北方向南傳的，中國早期的文化多集中在黃河流域，一直往南傳，當中少不免是因為外族南侵的戰爭，導致經濟及文化中心南移，當到海邊無路可走之時，就只剩下出洋一途，但人雖在異地，帶去的文化卻較原來中心地區的文化更為傳統。換言之，也比較保守。但古代中國又是將自身文化定位為開放性的，《書經》便有『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之文，可見至少在概念上文化的同一性是可以處處皆然的。這個傳統思想指導了不同地方的共同文化特色。從以上所說的來理解，南洋華人社區所保留的傳統文化能夠較為完整，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有見及此，朱教授建議，藉現在中國興盛強大，華人領袖更應把握機會，將一些保存完好的傳統文化北傳回內地，為祖國的文化發展作出貢獻。

朱教授笑言，當時許多中國到美訪問的著名學者，如王毓銓、徐朔方、徐莘芳、田餘慶諸先生，都稱讚他肯坐冷板凳。畢竟做歷史研究，如不能靜下心來飽覽群書，在茫茫書海中尋找相關資料，辨認其原委，考訂其真偽，鑒別其優劣，是很難把研究做好的。朱教授非常感激牟復禮教授，如非牟教授給他這樣好的機會，他亦不能進一步打好文獻基礎，也不能開展他日後見稱於學界的研究。「那個時候是普林斯頓東亞學的黃金時代，對我來說，也是學術生涯中最好的奠基時代。」朱教授如是說。



朱教授在辦公室分享他的經歷。

1989年朱教授離開普林斯頓，受聘到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員，三年之後升任正研究員，再過一年升任歷史學組主任。他說，在台北的日子，最好就是讀書。「中央圖書館藏的原裝善本明人文集，我基本上都看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收藏的明清文集多不勝數，我也用過不少。還有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珍藏的，也時有所利用。在這三個圖書館中穿梭往返，是我在台灣非常重大的收穫。」

談到在離港十多年後最重要的事情，朱教授說是1992年獲美國國會智庫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選任為駐院

研究員（Residential Fellow），在位於首都華盛頓國家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資訊中心的研究室內閱讀和聽講座的整整一年。美國政府給予的資助，還包括給予1名研究助理。這名助理主要是給朱教授到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借書和拷貝資料。朱教授當年進行他的明代鄉約制度研究，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收集了不少國會圖書館藏書中的資料，包括很多韓國鄉約的文本，對研究大有裨益。朱教授說，回頭一看，能夠獲選為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實屬榮幸，只可惜「書海茫茫，不能窮盡，但知道世界上有那些地方藏有自己研究範疇的『寶貝』，日後有機會，便懂得運用」，還是很難得的經驗。



朱鴻林教授素描像。

在書海浮沉多年之後，朱教授說：「我最喜歡的還是教書。」

機緣巧合回港執教 以心相許，以行印證的教學

「猶記得回歸前，移民潮正值高峰，香港的高校院所很多人才流失，當時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當講座教授，他向中文大學時任校長高錕教授建議延聘一些具有香港背景，同時又在海外留學和工作過的學者到中大執教。我便是其中之一，1995年到了中大，先當訪問學者，不夠一年時間，中大就邀請我留任當高級講師，我答應了。回歸前夕，中大又作出邀請，希望長聘我，我非常樂意，所以未到回歸，我就被中大長聘了。」及後因為在台北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朱教授要請假三年，但也許下承諾，學校如果能夠給假三年，他也必定回港任教。學校終於給了，朱教授也於2000年踐諾回港，在中大執教了9年，培養了9個博士生和8個研究型碩士生。

「把你的心掏出來，不要羞辱學生、不要輕視學生，不要挫學生士氣，給他們挑戰，給他們指導，為他們開解，不苛求他們達到你期望他們達到的目的，只要求他們用心治學，不失以後參與作育人才、貢獻社會的入門初心。這已夠讓我心滿意足了。師生互相珍惜，便是永久的收穫。」

朱教授高尚的教學精神和實踐，讓他獲頒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模範教學獎」，他是這獎項開始頒發以來，迄今唯一拿到獎項的歷史系教授。

2008年，香港理工大學通過了成立中國文化學系，開始物色主政學者。次年便邀請了朱教授出任創系系主任。朱教授認為，「在香港，這個學系非常有特色，所授知識包含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和藝術五大範疇。在一兩年間，我們便將整個系統建立起來，學校允許我們開辦中國文化碩士班，每年可以招收85名學生，直到現在，每年平均都有400多人報名。」除了碩士班，朱教授還創設了一個給理大本科同學副修的中國文化課程，開設了一系列的中國文化通識科目。及至2012年，終於得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批准，開設雙語跨學科中國研究（榮譽）文學士課程。除此以外，朱教授也招收研究型碩士生和博士生，迄今已有4位博士生畢業，並分別到了中國社科院以及台灣元智大學、湖南師範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夏令營2017的大合照，照片裡正中央者便是朱教授。

湖北長江大學任教。2012年，朱教授獲教育部聘任為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與劉志偉教授合作指導博士生，其中一位已經畢業，並獲得華中師範大學的教職。

研究路上 精益求精

在香港的教學工作使朱教授獲得滿足感，在研究路上，他亦孜孜不倦。在他的帶領下，中國文化學系每年從研究資助局取得的研究資助項目是理大人文學院學系中比例最高的，加上歷史學系的整體研究成績優異，學校因此擴大該系的教席數量。「去年中國文化學系遞交了5個研究計劃，今年公佈結果，有3個成功獲得資助，成功率是60%。幾年前我自己亦獲得第一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傑出研究學者獎，與嶺南大學前歷史系主任、同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戴仁柱教授（Richard Davis）同屆得獎，大家都十分開心！這裡我真的很感謝理工大學給予機會讓我實踐理想。」

《明儒學案》——這本認識和研究明代思想史的必備之書，朱教授與之結緣到今天已經40餘年。「這本書雖將明朝儒學的精要盡收囊中，唯傳世的各個版本都有差異。」因此，校訂《明儒學案》便成為了朱教授的「用心」和「得意」工作。「我這個研究，先獲得研究資助局的優配研究項目獎金70多萬元，再獲得研究資助局頒發人文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獎獎金80餘萬的資助，是獲獎學者中資助額度最高的。」未來幾年，朱教授將就此書研撰三種不同的專書，給三個不同類別的讀者閱讀參考。這三種書分別是給研究學者使用的《明儒學案》校訂本；給一般讀者介紹明朝儒學發展概況以及儒學大師們的生平和思想重點的《明儒學案》選注；給研究生作自學入門的《明儒學案》研究手冊。最根本的，還是「希望可以為學術界推出一個可靠的版本，供學者作深入研究之用。」治學嚴謹是朱教授的寫照，僅一本書，就足以讓他窮半生精力去做研究，力臻完美，為後來者不遺餘力，這是一位士人的文化承擔。



2015年朱教授在香港孔子學院講座：「《四書》與近世中國文化簡介」任主講嘉賓。

弘揚中華文化 設計課程和舉辦學術講論

朱鴻林教授在2012年開始同時擔任理大的香港孔子學院院長。因應香港複雜多變的政治社會形勢，他促成了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與理大協議改組孔院，將孔子學院改置於人文學院之下。「這個改變的影響就是我們可以開授給理大學生修讀的學分課程，孔院的運作變得更加穩定，有利開展不同的文化項目。」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朱教授領導下的孔院在這幾年每年都舉辦多場的「中國文化及宗教傑出學者講座」、「中國歷史與文化專家講論系列」、「港澳珠三角地區研究生中國歷史文化研修班」等高端學術論壇，又為理大師生舉辦以香港為本的文化遺產考察，還舉辦了多個國際性或地區性的學術會議，包括去年的「中國近世宗族祠堂與祖先祭祀學術研討會」等，合辦第七屆「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國際會議」等。院內又設有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匯聚專家學者，對文獻、歷史、文學、宗教等的議題

舉辦學術會議及編撰歷史文化讀物，以促進學員及公眾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要旨。中心現有中山大學劉勇教授的「修身日記」、社科院解揚副研究員的呂坤《實政錄》等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研究計劃二十多個，將來計劃出版中英文的普及叢書。這亦正是香港孔子學院與世界上其他孔院的不同之處所在——它是一個研究型的孔子學院。 



2016年孔子學院與理大舉辦「善心妙筆：施子清個人書法展」。圖中為施子清博士，SBS，JP（右）手提他所寫的朱教授題這個書法展覽的詩作：「已空色相等如來，任掃煙雲淨硯台。韻趣從心超格局，黃花翠竹向天開。」這幅字至今仍掛在朱教授辦公室內。

後記

朱教授窮半生精力，在文史哲三個範疇中努力不懈，不停創新，用不同方法去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樂此不疲，可以說是真正的寓學習於工作，尋樂趣於貢獻。在我們看來，這其實充分表現出他對文化使命的擔當，體現了他的胸懷和抱負。北宋張載曾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的是以仁孝等傳統思想作為社會核心精神價值、為蒼生選擇正確的路向，讓百姓確立自己生命的意義，傳承學統，以儒家所追求太平和大同等觀念，奠定長久的精神基礎。用張載這句說話來概括朱教授，也不為過。訪問期間，有些艱深的字詞意義，朱教授都會手把手的教會我們，一筆一劃，清清楚楚。他說話不徐不疾，遇到有機會使人含混的語句，他都會用普通話和廣東話各講一遍，將概念講清晰，解明白。一舉一動，溫文爾雅，給人一種莫名的親切感，也許這就是一位儒者特有的親和力吧。